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王维平,王梓涵.人工智能时代拜物教的新变化及其思想政治教育对策——基于《资本论》拜物教理论视域[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7(1):107-112.

人工智能时代拜物教的新变化及其思想政治教育对策

——基于《资本论》拜物教理论视域

王维平 王梓涵

(兰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摘要:马克思的《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形态、性质和秘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劳动形式发生变化,人与人的关系被异化为物与物的关系,拜物教呈现为技术和数字拜物教等新形态,对社会尤其是人文精神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人文精神在人工智能时代受到数字拜物教的影响呈现出一些异化现象,具体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自我精神的异化。基于此,对于人文精神疏离问题,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做出应有的时代回应。

关键词:资本论;拜物教理论;数字拜物教;人文精神

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4)01-0107-06

一、马克思《资本论》拜物教理论的内涵与形态

“拜物教”是一个宗教词汇,是宗教信仰的原始形式之一,同“拜神教”相对应,最早产生于原始社会。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低,人们缺乏科学文化认知,无法解释风火雷电等自然物的发生机理。由此,人们认为这些自然现象或自然物质具有“神秘力量”,是能够支配一切的神灵,因而加以敬畏与崇拜,并以此来避邪祈福。1756年,法国人类学家德·布霍斯在对原始部落的研究中发现了这种原始宗教,并在《南半球的航海历史》一书中首次提出了“fétichisme”(拜物教)的概念。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主要体现在《资本论》及其四大手稿中,主要内容

包括拜物教的产生条件、演变历程、表现形式、本质特征、社会结果和消失条件等方面。随着马克思所处资本主义时代劳动形式的更迭变化,拜物教的相关理论也从最初的商品拜物教发展至后来的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

(一)马克思《资本论》中拜物教理论的生发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第四节的《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出发,对商品拜物教概念作了全面的解释。“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是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

收稿日期:2023-09-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新内涵研究”(20FKSB015);兰州大学“簪政基金”项目“人工智能时代人文精神疏离问题研究——基于《资本论》拜物教理论视域”(LZU-JZH2610)

第一作者简介:王维平(1957—),男,甘肃兰州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通信作者:王梓涵(2002—),女,甘肃兰州人,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E-mail:1249810591@qq.com。

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拜物教。”^{[1](P89~90)}可见,马克思从宗教的拜物教概念中引申出了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拜物教,马克思所说的物指以商品货币为代表的体现“物”对人的统治的“物”,是现实生产关系下的实在的“物”,而非宗教世界里虚幻的“物”。可以说,商品拜物教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中人与人的关系扭曲为物与物的关系,呈现出一种隐蔽和虚幻的社会生产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排除法分析了商品拜物教的生发原因。其一,从使用价值角度分析,商品拜物教不会发生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上。这意味着一个有用物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需要并不神秘,一个有用物作为人类劳动的产品具有某些属性也不神秘,但它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变成可感觉又超感觉的物了。因此,商品的神秘性质不是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其二,从商品价值角度分析,商品拜物教也不会发生在价值规定的内容上。具体而言,所有商品实质上都是人的脑、神经、肌肉、感官等的耗费,所有社会都关心生产生活资料所耗费的劳动时间。一旦彼此为对方以某种方式劳动,劳动就取得社会的形式。因此,商品拜物教也不会发生在价值内容上。基于此,马克思作出了“商品拜物教发生在商品形式本身中”的结论。

商品拜物教的形成主要源于私有制商品经济的社会背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基于劳动二重性分析拜物教,认为“商品世界的这种拜物教性质……是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1](P90)}。在商品经济中,当劳动产品作为商品进行生产时,它们就从普通的可感知的“物”变成了既可感知又超感知的“物”。此外,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使得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商品的价值。而“劳动产品一旦表现为商品,就带有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这种生产方式分不开的”^{[1](P90)}。由此,人们被商品生产经济规律所支配。对于商品占有者而言,他更关注商品的交换和价值,他与劳动者的关系通过他与商品的关系表现出来。从这个逻辑来讲,人与物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的关系,这种被遮蔽的关系被马克思称为“商品拜物教”。

(二)马克思的货币拜物教理论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二章《交换过程》

中,马克思阐述了货币拜物教的秘密和本质。首先,马克思分析了商品交换的条件和交换的必然性。他指出,私有制是商品交换的基础,法权关系由经济关系决定;商品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对他人具有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必须通过交换来解决;交换过程,既是个人的过程,又是社会的过程。其次,马克思认为交换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货币的形成过程。他指出,货币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金银之所以能够成为货币,不是金银天生就是货币,而是金银天生适合制作货币材料,是人的交换关系把金银提升到了货币地位,而非相反。最后,马克思揭示了货币的本质并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货币理论进行了批判。马克思认为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交换过程给予货币的不是其价值而是特殊的价值形式;货币不是物的自然属性,而是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反映。

货币拜物教的产生离不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商品交换愈加频繁,人们对于市场的依赖比以往更加强烈。此外,大量的商品交换产生了对于统一商品价值衡量物的需求,从最初的特殊等价物发展到一般等价物,最终货币成为被市场广泛认可的等价物。“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金银。”^{[1](P108)}金银在商品交换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便携、坚固等特性使其从交换物中渐渐脱颖而出,成为最终的一般等价物。人与人的关系也因为货币的出现被掩盖了,人们由原先对商品的膜拜变为对货币的崇拜,商品拜物教向货币拜物教转变。但两者并非毫无联系,因为“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1](P113)}。

(三)马克思的资本拜物教理论

马克思没有明确提出资本拜物教概念,但他在《资本论》中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时体现了对资本拜物教批判的思想。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关系被资本关系所驾驭,商品生产转化为剩余价值生产,商品本身成为手段,资本积累和扩张成为目的,这种生产关系的本末倒置就是资本拜物教的表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机器上,劳动资料的运动和活动离开了工人而独立了。劳动资料本身成为一种永动机。”^{[1](P464)}这也让人们产生一种机器本身就能独立地生产财富的错觉,进而产生崇拜。“当资本家把货币转化为商品,使商品充当新产品的物质形成要素或劳动过程的因素时,当他把活的劳动力同这些商品的死的对象性合并在一起时,他就把价值,

把过去的、对象化的、死的劳动转化为资本,转化为自行增殖的价值,转化为一个有灵性的怪物,它用‘好像害了相思病’的劲头开始去‘劳动’。”^{[1](P227)}在这里,马克思借用拜物教理论的话语,揭示了资本具有独立作用的功能,资本变成了有灵性的怪物,好像资本本身就可以自主劳动似的。这鲜明呈现了资本拜物教的特征。

(四)马克思关于拜物教的核心观点

综上,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拜物教理论的核心观点如下。

第一,拜物教产生的认识论根源。从原始社会的自然宗教到文明社会的社会宗教,人的信仰逐渐对象化。人们对自然和社会许多无法解释的现象归因为神的力量,对上帝或神的信仰和崇拜引发出宗教迷恋。人们对宗教里神的迷恋本质上是对自己命运的困惑和不安的折射,这种迷恋在现实生活中转化为物统治人的现象。

第二,拜物教的本质和秘密的揭示。私有制条件下的商品、货币、资本都成为了人们宗教般崇拜的对象,资本主义私有制更加深了物对人的统治,使得拜物教发展到极端。拜物教的本质是人对社会关系的颠倒的、错乱的精神反应,它把人与人的关系扭曲为物与人的关系,从而导致精神异化。

第三,消除拜物教社会条件的分析。遏制拜物教的价值旨归是要把人的世界及其关系还给人自身。因此,消除拜物教的根本途径是消灭私有制和商品货币关系。彰显人的主体地位,驾驭资本逻辑,是消除拜物教的必然要求。

二、人工智能时代与拜物教的嬗变

在人工智能的时代背景下,人工智能技术对社会生产和人们的社会关系乃至思想观念产生着深远影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在生产生活中的广泛应用,由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演化而来的技术拜物教开始出现,技术拜物教又具体表现为数字拜物教、智能拜物教、符号拜物教、景观拜物教等不同形态的拜物教。

(一)人工智能时代的特征

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社会中信息的传递、科学技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着变化。

一方面,通过人工智能,人类知识达到新的深度和广度。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帮助人类更快速、更精准地处理和分析数据信息,优化信息处理流程。作为人类器官

的延伸,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提升人类的感知能力,帮助人们理解和解释复杂的现象。例如,在图像和语音识别方面,人工智能技术使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处理视觉和听觉信息,从而深化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由此,人工智能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人类认识的深度和广度。

另一方面,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使得信息传播更加快速、广泛和便捷。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被数字化并储存在网络中,并形成庞大的数据库。此外,人们的信息获取与传递方式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们通过互联网检索查询所需信息,并开展信息的传递与交流。基于互联网,人们的社交方式发生改变。通过社交媒体,人们可以突破时间与空间限制,几乎实现社交自由。互联网还为经济活动提供了新的渠道和平台,线上支付、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发展。在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基础上,跨国和跨文化交流更有可能,整个社会更具有“流动性”。

(二)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的数字技术异化风险

在人工智能的作用下,数字技术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现实生活中的实体相对应,“人”以“虚体”^[2]形式存在于虚拟世界。人作为个体在虚拟世界中被符号化为数据。这意味着人们既生产数据,又将自己抽象化为没有思想和形状的数据符号。在与数字技术融合的过程中,人的劳动被数据遮盖。与马克思时代的工业劳动相类似,数字劳动存在异化风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数字劳动与“数字工人”相异化。在人工智能时代,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因劳动工具的变化,其劳动形式也发生了变化。曾几何时,工厂里的工人各居其位、各司其职、现场直接协作生产的场景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自动化的流水线和居家办公、线上工作等劳动形式。这个时候的劳动者是典型的“数字工人”。他们以数据的形式存在于数字端口,在虚拟世界里忙碌地生产数据。与传统工人不同,“数字工人”不再局限于特定群体,网络聊天、图片分享、视频播放……网络上的行为被数据化,每一个产生此类数据的网民都可被称作“数字工人”。在数据的生产过程中,“数字工人”通过劳动生产数字产品获取薪酬,其中的中介是网络平台。网络平台将数据“商品”进行售卖,数字工人的劳动力成为平台价值增殖的工具。由此,“数字工人”原本自由的闲暇时间被压榨,他们为平台提供生产剩余价值的数字劳动。操纵数字平台的“数字资本家”以更隐蔽的方

式剥削“数字工人”。

其次,“数字工人”生产的数据产品本身发生异化。“工人在劳动过程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的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3](P48)}人们的思想和意识被赋予在其所产生的数据上,数据汇入平台,附着于数据中的思想和意识则开始异于之前的存在。正所谓“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无论是数据符号亦或语言符号自出现在网络平台后便不属于产生它的人,它们可以被随意解读并赋予不同的含义。除了含义上与生产者相疏离,数据在网络平台被商品化,变成为其获取利润的商品。在这一过程中,数据越来越成为异己的力量,其背后的生产者也越来越被数字资本所操控。人与人的关系在数字时代发生异化,逐渐成为不受时空限制的关系,呈现出虚拟化特征。传统的交往方式发生变化,线上交友、虚拟好友等新型交友方式代替了以往的现实交往,呈现出数据符号间的交互特征。这种数据符号的交互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逐渐淡漠,社会关系间接化、虚拟化则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疏离。

最后,人自身在人工智能时代发生异化。马克思指出:“人是类存在物。”^{[3](P51)}在数字时代,资本对人的劳动剥削从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转变。在数字时代,人们的一切生产生活几乎都离不开数字技术,由于其自身所具有无偿性、娱乐性等特点,人们乐在其中而对时间流逝不自知。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时间替代金钱成为了新的“等价物”作为衡量标准。至此,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同时被压榨金钱和时间,人的类本质发生了异化,有学者将此状况称为“人自身的本质被‘连根拔起’”^{[4](P225)}。

(三)人工智能时代拜物教的新形态

马克思之后的一百多年来,拜物教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关注的问题领域,他们从各个学科和角度,基于马克思《资本论》的拜物教理论、基于时代发展状况不断进行拓展研究。他们从现当代社会拜物教的新形态及其本质特征与社会效应展开了研究,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拜物教理论,特别是从“客观”的“物”的视野转换至“主观”的“人”的主体性的思考上来,从经济生活领域的拜物教转换至技术、文化和精神生活领域的拜物教的解析上来。综合而言,学者们基于时代对于马克思拜物教理论的研究可大致归纳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文化—意识形态批判意义上的拜物教理论,代表人物是卢卡奇、本雅明、鲍德里亚、居伊·德波等;第二种型是精神

分析视域下的拜物教理论,代表人物齐泽克等;第三种类型是进入 21 世纪,随着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众多中外学者开始了对信息拜物教和技术、数字拜物教的研究。本文基于人工智能的时代背景重点关注数字拜物教和技术拜物教两个形态。

从特殊性来看,数字拜物教是拜物教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最新发展样态,是资本金融化、信息化和数字化相结合的产物。数字拜物教通过数据商品交换关系营造出一种虚幻的消费现象,数字资本增殖逻辑主导着数据商品的交换秩序。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出现新特征,从马克思拜物教理论中直接或间接地衍生出新型拜物教,如本雅明的“幻象拜物教”或“奇观化拜物教”、让·鲍德里亚的“符号拜物教”或“能指拜物教”、居伊·德波的“景观拜物教”、伴随高科技产生的技术拜物教和数字拜物教(数据拜物教)等。当下资本主义进入数字经济时代,虚拟生产和“时间掠夺”都昭示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新形态——数字资本主义。随着互联网平台愈发强大的数据收集、分析、处理和预测的能力提升,数字资本主义发展出一种特殊的形式,即大数据资本主义。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对商品货币和资本的迷恋转为对数字技术甚至数字本身的迷恋,数字拜物教由此产生。

从一般性而言,技术拜物教是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异化加剧的特殊产物。技术拜物教是技术作为“物”掩盖的人与人的关系。它忽视了技术设计及技术发挥作用的真实过程;只见技术实体,不见技术体现的关系;只见技术的使用价值,忽视技术的价值创造过程;只见技术的工具价值,忽视技术的内在意义;技术的价值中立掩盖了技术的价值负载;以技术的物理属性掩盖技术的关系属性。所以从表面看,不是技术中体现的种种关系居于主导地位,而是物化后的技术实体占主导。^[5]

(四)人工智能时代拜物教的人文精神疏离现象

显然,人工智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人工智能打破时空局限,使得人们足不出户,通过人一机一人的形式就能实现交流互动。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的拜物教以“数字拜物教”“技术拜物教”等新形态出现,产生并有可能进一步加深人文精神的疏离现象。人文精神注重对人的尊严、价值和命运的追求与关注,强调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致力于谋求人的全面发展。必须注意到,人工智能正在并有可能进一步影响的主体地位并产生人文精神的

疏离现象。

人文精神疏离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其一,人与人关系的疏离,即人的交往异化。智能技术时代,人与人之间的现实的、物质的和精神的交往关系被技术所取代,人们的交往从重要的生活目的变成了满足物质技术需要的手段,感性体验不复存在,只剩下冰冷的数字信息。其二,人的自我关系的疏离,即人对自我认知的迷失。人是思考的动物,人会在自己创造的对象里面反观自身。但是,在智能化和数字化时代,智能技术本身好像成了有智慧的生命,而人则变为愚钝的、受智能或数字技术支配的动物。其三,人与物关系的疏离,即人的生产物反过来支配人。本来机器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是人通过技术工具手段对自然界的利用。但在智能时代的数字拜物教影响下,智能是非人的智能,技术是非人的技术,数字是非人的数字,这直接导致了人与物关系的疏离。其四,人与自然关系的疏离,人与自然的关系愈来愈恶劣,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遭到破坏。在技术越来越被人们用来成为获取财富的手段时,资本逻辑就越来越通过利用技术手段突破自然限制,把整个自然界仅仅看作是可以利用的资源。这使得人文精神的丧失和生态意识的丧失并行不悖,自然界不断成为人类获取最大化利益的牺牲品。其五,人的“感性解放”进程受阻,即人在前四个方面关系的疏离条件下难以实现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感性解放是人的解放的应有之义,感性解放和物质解放同样重要,任何一种解放都是为了使人的关系及世界还给人本身这一人的解放的核心命题。在智能技术时代,人们被困于技术手段、技术形式,人所身处的环境即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也因技术异化而变得疏离、陌生,人们难以摆脱环境异化的困扰,这导致人的自我感性解放进程受到阻碍。

显然,“数字拜物教”“技术拜物教”等拜物教新形态导致的人文精神的疏离现象值得警惕并引起重视。

三、人工智能时代拜物教的思政教育对策

拜物教理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武器,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使得拜物教理论也不断更迭。作为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形式,数字资本主义存在以往资本主义所不具备的新特点。拜物教也演变为“数字拜物教”“技术拜物教”等新形态。这些新型拜

物教的出现直接导致了人文精神的疏离现象。人文精神的疏离是智能时代已经和有可能产生的一系列人文精神偏离、疏离、缺失、受制现象的总和。这种偏离既表现在整个社会中,也重点表现在青年一代中。由此,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用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论为指导,为人文精神疏离问题的预期性应对和突出问题的解决提供切实对策。

(一)强化人的主体性教育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地位,认为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的发源地,劳动人民是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历史是客体向度和主体向度的统一,历史是人的活动的结晶。正是由于人本身才创造出人类自身的文明,人类才有了各种伟大的发明创造和文化积淀。但是,人们崇尚技术进步和技术成果的同时,更要崇尚创造技术的人。在技术面前,马克思曾经指出,“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6](P198)}由此,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先进技术面前,人们要认识技术拜物教所带来的影响,警惕对技术本身的盲目崇拜和高度依赖,防止在人自身创造的对象里失去自己。要在智能技术的辉煌面前,明确人的主体地位的不可替代性。特别是在思想政治教育阵地上,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教育,让受教育者对人与自然或科技的关系是以人为主体的、人的活动本身是实践等原理具有深刻认知,并正确应用人工智能技术。

(二)积极培育人文精神

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艺术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6](P34)},即精神或艺术生产也具有相对独立性。“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态只有在艺术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6](P34)}也可以说,最震撼人心的艺术产生于对痛苦的回忆和反思。这也意味着人是靠物质和精神双重的拐杖支撑着的伟大而又无奈的生灵,需要精神的依托。值得注意的是,精神领域不能空白,先进文化不去占领,世俗文化甚至腐朽文化会填充空白。面临数字拜物教的影响,高校教育应倡导先进文化,重视先进意识形态引导,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大学生,积极培育人文精神。

习近平指出:“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那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7](P315)}在人文精神疏离的情境中,青年一代应

当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在大历史观中领悟自己的时代担当。为此,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加强中华文明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等教育,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哪来到哪去的问题,使青年一代更好地理解自己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使命,鉴往知来,砥砺前行。

(三)深化技术本质的教育

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6](P197~P198)]由此可见,技术的本质是手段或工具,智能技术也不例外。人绝不能在自己创造的对象里丧失自身,用马克思的话来讲,感性活动本身是实践的特征,是人的创造力的源泉。智能技术也是人脑的器官,不是技术在统治人、驾驭人,而是人类创造的技术手段本身,如果不能合理理解和利用,就会变成一种超感觉的神奇力量。在我们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要科学认识其双刃剑作用。因此,人工智能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人为主体,讲清楚技术的本质是生产工具,重视学生的情感体验,明确教书育人中要使受教育者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

(四)拓宽社会实践的渠道

马克思认为人与动物具有显著的不同。他指出动物的生命活动是其本质,而人则能使生命活动成为意志和意识的对象。这意味着人作为有意识的生命存在,不仅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而且还要证明自己的意识。摆脱智能技术时代的数字拜物教,需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承担起更重要的责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重构精神生活。人通过改造对象世界,使得“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8](P163)],这就是人的精神实践。马克思说,“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

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化之中,也是可笑的。”^[6](P56~P57)]基于此,思想政治教育首当其冲地要注重和强化学生的精神生活。其二,投入生活实践。人在现实世界中的精神实践首先需要选定具有可行性的实践目标,即设定理想。亚当·斯密说,“交际和谈话是恢复平静的最有效的药物;同时也是宁静、愉快心情最好的保护剂。”^[9](P23)]挣脱智能产品对人的束缚,摆脱数字拜物教,需要重视直接交往的社会实践活动。费尔巴哈也认为,“只有在感性之中,只有在空间和时间之中,才有可能让无限的、确实无限的、富有规定的存在者存在。”^[10](P55)]基于此,思想政治教育培育人文精神,社会实践是必要的途径。其三,追逐神圣理想。理想是对未来社会和自身发展的期望和追求,它源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是一个可以达成的目标。正是由于理想的引导,个人才能不断发展进步,社会才能持续发展。由此,思想政治教育要引导学生树立崇高的理想和信念。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蓝江.一般数据、虚体、数字资本—数字资本主义的三重逻辑[J].哲学研究,2018(3).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4]张一兵,夏凡.人的解放[M].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

[5]王华英.技术拜物教探析[J].理论界,2009(6).

[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0](德)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M].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责任编辑 肖芬蓉 E-mail:simple5222@163.com